

《新语文读本》：

一段历史，一个故事

xīnyuwen duben
yiduan lishi
yige gushi

新语文

钱理群 主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新语文读本》：

一段历史，一个故事

xīnyǔwén dúběn
yīduàn lìshǐ
yíge gùshi

钱理群 主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钱理群主编.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435-4823-7

I. 新... II. 钱... III. 语文课—课外读物—研究—中小学 IV. 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1156 号

《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

主 编◎钱理群

出版发行◎广西教育出版社

地 址◎广西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 编◎530022

电 话◎0771—5865797 5852408(邮购)

传 真◎0771—5865797

本社网址◎<http://www.gxeph.com>

E-mail◎book@gxeph.com

印 制◎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787×980 1/16

印 张◎25.5

插 页◎2 页

字 数◎533 千字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 000 册

书 号◎978-7-5435-4823-7/G·3879

定 价◎34.80 元

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

《新语文读本》： 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钱理群

已经整整七年了！《新语文读本》从1999年8月启动，2001年3月开始出书，到2006年8月进行修订，自身已经形成一段历史。尽管它还在进行中，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但我们已经可以对它进行或一定程度的历史回顾与总结。

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

“我们”是谁：一段历史

我们都是普通的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学者、编辑，我们分处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我们或早已相知，或原不相识，但却聚集在“新语文”里，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而且有了共同的名称：“新语文读本”人。

那么，“我们”是谁？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教育的大变动、大困惑中，“我们”将何以言说？何以存在？

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通过《新语文读本》，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显示我们的存在。

那么，这是怎样的声音和存在？“新”在哪里？它又先天地存在哪些限制？

一、民间教育改革的实验

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政府行为，这不仅是由中国式改革的总体特点所决定，更是由教育的国家性质所规定的。因此，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必然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主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我们讨论的前提。

但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却会带来许多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

曾经谈到：“由此产生的却是一个如何使这样的政府主导的改革变成校长、老师的自下而上的自觉努力，形成上、下的良性互动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的改革现实却更多的是仰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这样的行政命令又是基本上不考虑具体学校与教师的教学实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形成了一个刚性的‘大一统’的模式；而推行改革的基本手段也是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这样的行政操作，自然也是以是否符合上级领导的要求为评价标准。这样，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一个外在的、强制性的纯粹的政府行为。说严重一点，改革成了与校长、教师以及学生自身的生命发展无关的事情，甚至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是，教育改革、甚至教育自身的内在动力与内在尺度的匮乏，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民间教育实验的意义与力量》）

民间的自下而上的语文改革实验运动正是这样应运而生。

民间改革的特点与优势，恰恰在于它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与明确的内在尺度。它是一个“自愿”的集合，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投身于“新语文”这样的民间改革实验，是因为这是我们内在生命的需要。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不仅我们这些编者、出版者，而且那些把《新语文读本》作为补充读物引进课堂的老师，把《新语文读本》推荐给孩子们的社会人士（包括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家长，以及最后接受了《新语文读本》的孩子（这里所说的“接受”是指真正喜欢并受到了影响的中小学生，它显然比书的购买者要少），他们“自愿”地选择了《新语文读本》，也就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语文”民间改革实验，而他们的参与，也是出于内在需要：不满意于语文教育的现状，希望改革，寻求新的语文教育的资源，以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不仅是一个内在动力，也是一个内在尺度。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读本的编写、出版者和推荐者、使用者共同组成的自愿的集合，也可以叫做教育“志愿者”群体吧。其特点与价值、力量就在这里。其限度也在这里：没有价值的认同，就会远离你；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影响。

民间改革的另一个特点与优势，就是它的相对独立与自由。至少是体制方面的限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要少一点。这就有可能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吸纳更广泛的精神资源和语文资源，在编写上思想也可以解放一点，旗帜鲜明地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更具有实验性，自成“一家之言”。用我写的《恳请参与〈新语文〉编写工作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是民间操作，可以较少束缚，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放开手来编”。这或许也是《新语文读本》受到欢迎的原因。而这样的社会认同与影响，又会反过来对体制内的教材改革产生影响和制约：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作用。

而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民间语文教育改革的实验，一直在进行着，发展着：我们并不孤立。就课外读物的编写而言，就有多样的尝试。我所看到的，像于漪老师主编的《高中文化读本》，王尚文先生另组班子编写的《现代语文读本》，深圳中学严凌君老师一人编写的《青春读书课读本》，等等，都各有特点，又和《新语文读本》相互声援。还有许多第一线的老师，他们在推广这些读物的同时，也在编选补充读物，在自己的班级、学

校和一定的范围内流传。更有不少语文教育的杂志，也以一定的篇幅刊登经典选文或当代美文，作为教材的补充。这样，就逐渐打造出一个相对高品位的课外阅读的民间语文教育空间和精神空间，而且还在继续扩展中。

而这样的课外读物的民间编写，只是民间教育实验的一个部分。前面所引述的《民间教育实验的意义与力量》一文，就是我为福建的一批朋友所进行的“生命化教育”实验所写的。他们所选择的实验点，大多是边远地带的乡村学校，而且以小学为主：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在这篇文章里，我还提到了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和社会上出现的“青年志愿者”，他们“正在从城市走向农村，从东部发达地区走向西部落后地区，从事支农和支教工作”。我提出我们这些教育部门里的“志愿者”，应该和“青年志愿者”结合起来——我和商友敬先生就曾经资助青年志愿者在西部农村建立了六所图书室，送去了大批《新语文读本》，以实现我们“让农村孩子有机会接触人类文明经典”的梦。而且进一步产生这样的“设想”：“这样的民间志愿者自发进行的教育改革实验，至少可以打破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单一的教育改革的格局，形成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良性互动：民间的改革实验不会影响政府改革的主导地位，却能够成为一个有力的补充，加强其群众基础；同时，民间改革实验的民间立场所特有的批判性、反思性与相对独立性，又能够对政府推动的改革形成某种制约。这都有可能对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生态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都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毕竟有了可能性，这也是能够使苦苦挣扎的我辈，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

或许我们把《新语文读本》放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才能显示其意义。

这里，谈到了民间改革实验的“制约”作用。其实，“制约”从来就是双向的：它的民间性，对自身也是一种制约。这直接关系着它的自我定位。我们在编写《新语文读本》时，以今天对它作出评价和总结，都涉及这个定位的问题。

正像我们在前面一再强调的，它首先是一个“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应该承认，这样的定位是在编写过程中逐渐明确的。编入本书的有关“缘起”的资料表明，在最初的预设中，这将是一套“供中学学生的自学、参考、对照的第二教材”，“还可以成为少数私立中学、实验中学、重点中学的第一教材”（《恳请参加〈新语文〉编写工作的一封信》），这实际是表明了当时是在“课文读物”（所谓“第二教材”）与“教材”（所谓“第一教材”）间徘徊，定位是不明确的。因此有朋友在讨论中，时有“教材”的提法，也是自然的。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现行体制下，要进入教材体系，就必须有诸多的妥协，以牺牲民间立场为代价，这是我们不愿意的；而客观情势也在事实上不允许我们进入。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教材编写的复杂性，以及我们自身的局限，如不具备条件而贸然进入教材的编写，占据可能决定千百万人未来发展的中心位置，我们以为是不负责任的，不如坚守民间读物的边缘位置，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实实在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表明，民间立场的选择，首先是我们的信念

所致，也是客观情势所致，同时是对自我局限性的一种体认。

我们最后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突出“读本”而非“教本”，并有了这样的定位：“我们关注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只是期待《新语文读本》能够成为众多的读物中有自己特色的一种”。——这里突出了两个概念：“众多”与“一种”，这其实是包含了对于语文教育的多元化格局的一个期待的。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我在给予满先生的关于《新语文读本》的信中，曾提到语文教育界的争论，以及我的态度：“语文教育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谁也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内在规律，任何主张都可能存在某种盲点，而且有些盲点一时还看不出来，是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学术讨论中，一方面每一方都必然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其某些合理的因素，从对方对自己的辩驳中警觉自己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而且“说到底，教育思想、观念上的是非不是靠争论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因此，在我看来，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语文界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大家不仅要尽量据理力争，而且各自按自己的观点，编出自己的教材或课外读物，并且在教学中进行实验性的运用，由此形成各家的良性竞争，而竞争的结果，不会是‘一家吃掉一家’，而是平等共存，互为补充，又相互制约。这对语文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是大有好处的”。而自由竞争，平等共存，正是最充分地显示了民间改革的特点：它是对“高度统一”的模式的反拨，它的使命就是要打破“大一统”的垄断格局，因此，它自身也绝不试图成为统领者，它只是“众多”中“有特色”的“一种”。

二、对“五四”启蒙传统的自觉呼应和追寻

在《新语文读本》的《编者的话》里，有这样的自白——

我们或许也有一点奢望，即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传统的自觉继承。先驱者们把中小学语文教育看做是“改造中国人与社会”的历史性工程的一个基础工作，关乎民族的未来。因此，许多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大师，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理论建设与教材、课外读物的编写。在我们看来，方兴未艾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能否健康、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继承与发扬前述语文教育研究的传统，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多学科合作、学者化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与思想文化界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提倡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同时，在语文教育界内部，也要加强语文教师与语文教育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新语文读本》的编写，正是这样一次尝试。

一位教育专家在评论《新语文读本》的工作时，指出：这是“人文知识分子与文科教育的天然联系”在被强行隔断以后的“修复”（杨东平：《追寻一个伟大传统》），这至少是

说出了我们的一种追求的。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把中小学语文教育看做是‘改造中国人与社会’的历史性工程的一个基础工作，关乎民族的未来”的理念，它确实是对“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个呼应。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我们的工作就先天地具有“启蒙”的性质。

我在《恳请参加〈新语文〉编写工作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到了世纪之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时候，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唯一没有、也不敢绝望的事，就是为孩子们（也是为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听说就是这句话打动了许多朋友，引起强烈共鸣，有朋友甚至说，他就是奔着这句话来参加《新语文读本》的工作的。而这句话的背后，又有着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谈道：“现在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例如舆论的开放，政治体制的改革，等等，在我看来，都是21世纪必须要解决的；而最难解决的，还是中国民族精神、民族道德的损伤。这恐怕是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逐渐好转的。而真正要治好民族精神的创伤，除制度的变革外，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这就是我近几年来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的内在动因。”我想，这也是我们《新语文读本》同仁的一个共识。

于是，就有了《新语文读本》的这一定位：“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这套《读本》，既是语文读本，又是精神读本。”（《关于〈新语文读本〉编写工作的几点意见》）

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启蒙”的理念。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义。

比较容易注意到的，是基本观念的启蒙：《新语文读本》以精神命题组成单元，并提出一系列精神母题（详见《〈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都体现了这样的意图。而且不必讳言，这些精神命题、母题的提出，都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比如，在我们看来，中国民族精神的创伤，主要是精神的奴化与毒化，因此，我们主张通过广泛的经典阅读，提供精神资源，进行文化传承，把人类文明和民族传统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与理想在孩子的心上扎根：一是强调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提倡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二是强调对真、善、美的追求，提倡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提倡人道、博爱的精神；三是强调和培育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普通民众的血肉联系，提倡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与关爱，等等。

其实我们更为重视的，是对青少年内在精神的培育。因此，我们“自觉地将开发学生的感官，进行审美力的培育作为编写《新语文读本》的一个重要的贯穿性线索”。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基本想象”的概念，强调“作为民族和人类精神积淀下来的基本想象的传递”和“学生自身基本想象（对物质、生命基本元素的想象，对基本图形的想象，对时空的想象，等等）的开发”，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基本想象的培育，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宇宙观、世界观的形成，生命意识的培育，想象力的开发与表达能力的训练，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引导学生驰骋想象，诱发他们对未知的远方世界的好奇心的同时，我们

又注意引导学生感受身边的日常生活的美，培育他们的生活情趣。（详见《〈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如我们的一位编委所说，我们读本的选文，“应该体现人性的丰富和精神的浩瀚”，引导青少年“开拓最广大的精神空间，实现最丰富的精神自由”（摩罗：《编辑新的中学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这确实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其三，也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基本启蒙任务，就是言说方式、阅读方式的改变，培养全新的话语方式，文明的言说习惯。在我们看来，“话语是一个中介，它的一面是人的思维，另一面是人的行动”，“中小学语文教育主要是话语方式的训练”，即训练学生怎样“听”别人说话，自己怎样“说”话，怎样“读”书，怎样“写”作，其实都是直接指向和“影响人的心灵和行动”的。而以应试为中心的语文教育的要害正是在于它培育的是“八股”式的话语：“各式各样的八股，包括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和革命八股”。“土八股是养育奴隶的”，它引导学生“服从”他人（老师、考官、上级、上司）的意志，说别人的话，而“洋八股养育的是奴才”，其特点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故意照别人的意思说假话”，“讲歪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形式上却非常华丽”。培养一个人如何“听、说、读、写”，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我们的《新语文读本》和《新语文写作》提倡“主体性的自由阅读”，“儿童趣味写作，少年率性写作，青年公民写作”，其实质就是要“培养独立的人，有尊严的人，要让学生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参看《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

我们还十分重视“习惯的养成”，这是语文启蒙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所要养成的习惯，应着眼于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大抵可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语文学习的习惯。一个人从小就养成了爱书、读书的习惯，查工具书、写日记、记笔记的习惯，仅此一点，就为他终生学习奠定了基础。其次，还应该养成一些语言文明的习惯，如“表达真实的思想和情感的习惯”；“容纳多种声音”，“专注地听人说话”，“不打断他人讲话的习惯”；“在谈话与论辩中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习惯”；“勤思考、爱质疑的习惯”；等等。“这些习惯已经超出了技术的层面，而是一种人的文化精神，而所谓习惯就是将外在的要求化为内在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和行为。这样的语言文明习惯的养成，意义更是不能低估，这是鲁迅等先驱者一贯追求的‘国民性改造’的真正落实。可以设想，如果每一个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公民，都能养成语言文明的习惯，那么我们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参看《以“立人”为中心》）。——这也是《新语文读本》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所撰写的“阅读建议”，就始终贯穿着对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语言文明习惯的引导。

以上三个层面的启蒙，观念的层面是整个中小学教育共同的任务，而语文教育的经典阅读又自有其特殊的作用，而另外两个层面，即想象力、审美力与情感的培育，话语方式、语言文明的养成，则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功能与作用，只是过去的语文教育的技术化将其遮蔽了。我们因此而提出了“通过立言以立人，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和任务”的

理念，这也是《新语文读本》的“语文读本”与“精神读本”的定位的依据所在：这两者是存在着内在的统一的。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更符合课外阅读的特点和要求的。但这样的双重性在具体操作上也会有有一定的矛盾，如何在两者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是《新语文读本》编写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总体的处理是恰当的，但也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在修订中调整。

三、理想主义者的聚合

从《新语文读本》编写工作一开始，我们就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在一个世俗化、功利化，消解理想、消解神圣、消解价值的时代，举起了理想主义的旗帜。我们在《编者的话》里开宗明义：“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正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我们聚合在一起。

这也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在理想主义受到质疑，遭到排斥的现实中，坚持理想主义。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也因此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而为了摆脱孤独，我们又必须聚合。我在给一位编委的书所写的序言里早就说过：“中国人口多，教师队伍也相当庞大”，坚持理想主义的老师比例虽小，“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分散的有志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老师”，有必要、也有可能聚集、合作，做力所能及的事，“在相濡以沫中，会感到自己并不孤独”，并产生群体的力量。（《教育的真谛》）应该说，《新语文读本》就是这样的一个自觉的尝试。

其次，对我们这些教师、学者来说，坚持理想主义，就是坚守一种教育理念：在我们看来，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应该是理想主义的。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当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它又必须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社会现状保持一定的张力：它有净化社会、批判社会的职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教育应“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它应该有一定的神圣性，人们视学校为“精神的家园”，称学校为“精神的圣地”，就是这个道理。它对学生的引导，既要适应现实的需要，又要有精神的超越性。这也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区别所在。具体到语文教育，我们对以影视、网络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社会语文教育既不能采取漠视、对立的态度，又必须坚持“经典阅读”与“基本写作训练”：这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是不能“与时俱进”的。急功近利，赶时髦，追潮流，教育的低俗化、时尚化，从根本上是反教育的。我们正是为了坚守教育的理想精神，怀着教育的神圣感来编写《新语文读本》的，我们不遗余力地倡导“经典阅读”，引导学生“走近大师”，追求读本风格的“坦诚，自然，大方，大家气概”，都是这样的教育理想主义的体现。

无可讳言，在《新语文读本》的具体编写中，也蒙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当我们确定《新语文读本》不是教材，而是一套课外读物时，就已经决定了它所面对的不是

全体学生，而是特定的读者对象：这正是教材和课外读物的基本区别所在。而我们当时预定的目标是“既能满足一些希望进一步学习的学生的欲求，对中等程度的学生也自会有吸引力”。（参看《〈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这就意味着，我们预设的接受对象，主要是那些“有更大学习潜力”，语文课堂教育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欲求，希望通过课外阅读来求得更大的语文和精神发展空间的学生，他们一般说来，具有较好的语文基础，也有时间和精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而排斥大多数中等程度的学生，这里也有一条教育学的原则，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教育必须注意学生的可接受性，“但教育同时也应有一定的超前性，为学生设置一定的难度，使学生在克服困难中成长，而一旦战胜困难，就会使每一个学生的语言感悟力与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过去对青少年，特别是儿童学习语言（特别是母语）的潜能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语文教育的本质，就是创造优良的语言环境，提供丰富而科学的良性语言刺激，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教会他们自主学习，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个人的语文素养得到充实、升华与提高，获得健康的优化发展”。这也是我们为《新语文读本》设置的目标：“创造优良的语言环境，提供丰富而科学的良性语言刺激”，促成学生语言智能的“优化发展”。因此，“《新语文读本》所要树立的或许是一个较高的标尺”，但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在中学教育（包括语文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参看《〈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以“立人”为中心》）——这样的“高标尺”本身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定程度的超前性，是《新语文读本》的特点所在，它因此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它只能是多样课外读物中的一种，而不能成为普遍使用的教材或准教材。这样的目标，也给我们自身编写工作的操作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一定的高度、深度”与“可接受度”之间取得平衡，掌握好“度”。这其实也就是“理想”（教育理念、目标）与“现实”（学生学习的实际）的关系，这是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的。

我们因此提出，在坚守理想主义的同时，也要质疑理想主义，看到它自身的限制。或者说，我们所要提倡的理想主义，是充分看到自身有限性的理想主义，我们把它叫做“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我们深知，并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付出与收获绝对不成比例，甚至我们只能“只顾耕耘，不问收获”（这本身就是“理想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我经常对《新语文读本》的编委朋友说，我们所做的事、所能取得的成效，只能是小数点“零点零零零几”，但只要是正数，我就心满意足了。尽管《新语文读本》发行量算不小，但我深知，购书不等于读书，如果有千分之几、百分之几的读者，有几百个、上千个孩子读进去了，就不错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能影响一个孩子就影响一个。我们这些普通的教师、学者就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尽管有限，却要做：这也是理想主义。

我们因此提出了“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原则，即把理想（对“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落实到实处（“做小事情”）。这也就是《新语文读本》的《编者的话》里所说的，

“我们选择中学语文课外读物的编写工作，从一篇篇选文，一条条注释，一篇篇阅读建议……做起，只是表明，我们愿意为中国的语文教育改革增添一砖一瓦，仅此而已”。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教育理念、追求的质疑。在《编者的话》里，我们是明确地把“自我质疑精神”作为“《新语文读本》的最大特色”的，并且有这样的阐述：“我们从编选工作一开始，在为自己设立了一个高目标的同时，也自觉地把我们的追求相对化，从而认定：我们所提出的语文教育学的理念、原则和设想，在拥有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会存在不足和缺憾，因而是可以、并且欢迎讨论的。我们也将自我反思与认识深化中，在他人的批评、质疑过程中，不断对之进行修正，使之逐渐完善。”我们也因此为编选工作制定了一个“逐步到位”的策略：“它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和影响，将不断进行修订。现在只是‘初步呈现’，显示一个大的轮廓与总体风貌，使之在读者阅读实践中接受检验，并获得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新语文读本》不会自我封闭，而保持开放的态势：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四、“中小学语文学”的自觉实验

《新语文读本》的《编者的话》里，还有这样的明确宣示——

我们是把《新语文读本》的编写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来做的。无论是读本的选文、编排体系，还是阅读建议的编写，无不贯串着我们的教育理念，以及对中学语文学的追求。之所以命名为“新语文”，也是为了突出这种追求的自觉性与实验性。

这里，突出“语文学”的概念，是基于前文已经引述的一个观点：“方兴未艾的中小学语文学教育改革能否健康、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这是内含着一种隐忧的：“方兴未艾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其实是有着某种先天不足的，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大一统”的改革模式本身的问题，还存在着教育科学（包括语文学科学）研究的薄弱，不能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学术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这或许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前文中提到我们不敢贸然进入教材编写，其实就是看到教材编写的基本理论研究不足、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采取的谨慎态度。但我们也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只能从编写课外读物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某种实验，以求为“中小学语文学”增添一砖一瓦。

在我们看来，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语文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个问题，从而把语文学看做纯粹的技艺、经验之术，是既无理论，也无须专业训练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里的“语文学法”课程的边缘化是必然的，其自身也因为和教学实践的脱节而失去活力。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着意强调“语文学”的概念，突

出《新语文读本》的学术探讨和实验的追求。

以下将对我们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观念作一个简要的概述，由于已有相关的专文，这里仅提出要点，不作具体阐述。

1. 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

如前文所说，我们强调中小学语文教育培育青少年的想象力、审美力与情感的功能，培育学生的言说方式、语言文明习惯的功能，进而提出“通过立言以立人，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与任务”，就已经提出了我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与任务的一种理解和主张，据此而提出的是所谓“打两个底子”的观点。一是“打好终生学习的底子”：语言（母语和外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是人学习一切科学文化的基础。在学校里，特别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所能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但如果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并养成习惯，就能为终生的学习、不断吸取新知识，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语文教育的基础意义正是体现在这里。二是“打好终生精神发展的底子”：“中小学语文教育也是为‘做人’打基础的。本来整个中小学教育都有‘育人’的任务，但必须承认，语文教育在‘育人’方面有着特殊的功能与意义”，“语文教育所用的教育材料是语言文字，是各类文体的文章，文学作品又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都无一不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而“这样的精神灌注、文化熏陶也是影响终生的”。（参看《以“立人”为中心》）这里说的两个“底子”，即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人文精神的传承和文化熏陶，是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的，同时又是统一的：统一在语言文字的阅读、品味、学习、训练上。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2. 我们的“语文观”。

“在我们看来，语言不只是交际与思维的工具，更是人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与存在方式。语文活动就是人的一种生命运动。离开‘人’，‘言’无从依附；离开‘言’，‘人’难以自立。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大都积淀在语言文字之中；人们通过语文活动，吸取了前人创造的文明结晶，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时，语言通过交流而存在，在交流中学会使用语言，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人’。”（参看《编者的话》）这样的语文观，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强调语言文字的学习、运用不是纯粹的知识、技能的学习，而是和人的生命成长密切相关的：学习者通过“听”和“读”，吸取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通过“写”和“说”，实现和他人、社会的交流，成为“社会的人”。而这样的听、读、说、写的语文活动的文化内涵、生命内涵，恰恰是长期被遮蔽的，因此，也是我们要加以强化的。正是在这样的“语文观”的观照下，又提出了——

3. 我们的“语文教育观”。

“语文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语文活动，即它是有明确、自觉的教育目的，有指导的语文活动。学生在‘听、说、读、写’的语文教育和训练中，实现自我精神的成长，即人的成长；教师在指导学生语文活动的过程中，自身内在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也得到了激发。因

此，语文学习与训练是学生和教师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过程。”（《编者的话》）

这里自然贯穿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但重点是中小学语文教育有不同于一般的自学者、成年人的语文活动的特殊性。于是又有三个强调。一是强调语文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精神的成长，因此，“反对以知识灌输为中心，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听、说、读、写的语言实践为语文教育的核心”，即提倡“学生主体性的阅读和写作”。二是强调“学生的语言实践也必须是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绝不能把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理解为自发的随意性的学习，也就是不能走向‘儿童中心主义’的极端”，因此，在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学习的同时，也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教学境界，是教学相长，是“学生和教师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三是强调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的提高，是需要“训练”的，并且强调“以‘语文的能力训练’为整个语文课程体系的中心”，“我们今天进行语文教育的改革，不但不能忽视，而且应该加强对学生最基本的语文能力的训练”。（参看《以“立人”为中心》）作为我们的“语文教育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主张“作为一种语文运动，语文教育的聚焦应当是对准课文的言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创造学生的语感”。在我们看来，语感“是人和言语从而和社会文化联结起来的纽带”，也正是我们强调的听、说、读、写语文能力的训练和人文精神的培育与精神成长的一个契合点，《新语文读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优秀的言语作品来促进学生语感的广化、深化、敏化与美化，修正、丰富学生的语感图式”，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参看《关于〈新语文读本〉编写的一些设想》）正是出于对学生的语文能力的训练和他们的生命成长、生理与心理发育的关系的关注，我们提出了《新语文读本》编选的新原则，即“注意学生的年龄、心理、情感、智力……发展的特点，适应他们的发育、成长过程，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培育体系”，因此，我们确定，《新语文读本》“不按照语文知识的逻辑顺序来编选，而是依据学生生命发展阶段特征与需要，他们学习、领悟言语的阶段特征与需要来进行编选”。（参看《关于〈新语文读本〉编写的一些设想》）——这里提出的学生“生命发展，生理、心理发育的阶段性特征与需要”，“学习、领悟言语的阶段特征与需要”，以及两者的关系，正是我们在前文所强调的语文教育学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涉及脑科学、生长发育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多种学科，而这正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且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在编选《新语文读本》时，只能提出这样的原则，而难以有更多的实验。

但在《新语文作文》里，我们又做了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写作教育的实验，提出：“学生从童年—少年—青年，以及相应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写作，与人类从原始—现代的写作的发展程序是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的。而我们知道，人类的原初表达有三个特点：一是口头的，二是群体性的，三是将音乐、绘画、舞蹈与文学（诗歌、戏剧）混融为一体，是游戏性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才逐渐产生书面的表达，个体性的表达，以及

文学（从诗歌、戏剧开始，发展为各种文类）的独立表达，这是一个逐渐分离（书面从口头中分离，个体从群体中分离，文学从音乐、舞蹈、绘画中分离，意义从游戏中分离），而又保留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过程。在我看来，我们的中小学写作教育正是应该循着这样的发展程序来安排，以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详见《关于中小学写作教育的断想》）这些设想都有待实践的检验，或许更应看重的是把语文教育学的探索建立在多学科的研究基础上的思路与方法。

以上所讨论的，还是一般的“语文教育观”，而我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母语教育。于是，又有了——

4. 我们的“母语教育观”。

这是《新语文读本》编写工作的另一个关注点，“按汉语文的特点来建构新的语文教育体系”，是我们一开始就确定的理想目标。在编写小学读本时，我们更是明确地提出：“汉字的装饰性、游戏性与音乐性的特点”，是“与儿童的天性相通的”，这是“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得天独厚之处”，在读本的编写中应“突出汉字的特点”，“充分注意儿童学习语言的趣味性、游戏性的特点”。（参看《关于〈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通信》）但我们同样也遇到了研究不足的限制。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汉语文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如何将汉语文的特点与中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规律，以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对语文教学的要求这几方面有机结合，如何从传统的汉语文教育中汲取有益的资源”，我们都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实验还是有限的，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忽视。

母语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强调汉语文的特点，其特殊优长处，以及为中小学教育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汉字难学’这个客观事实，以及给我们的语文教学所带来的特殊困难”。由此提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应该加强对学生最基本的语文能力的训练，也即过去所说的字、词、句的基本功训练”；二是强调“在这些方面，过去几十年的语文教学还是积累了不少经验的，同样应该有分析地吸取、借鉴”。（《以“立人”为中心》）在对中学生作文的点评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提醒：“使用标点、遣词、造句……上的问题都不可小看。正确地准确地表达自己，这是写作的一个前提。中学写作教育中，字、词、句的基本训练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点评两篇作文》）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新语文读本》的课外读物性质，我们预设的读者是基本训练基础较好的学生，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语文基本功的训练列入读本的要求中。这也是《新语文读本》的一个限制吧。

5. 我们的“选文观”。

如前所说，《新语文读本》注重与提倡的是“经典阅读”。我们赞同前辈的主张：要“从人类与民族经验中，选出最主要的来，供做教学的材料”（参看陈伯吹：《小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的检讨》）。在我们看来，“经典是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历代前人智慧与创

造的积淀；而真正的经典又总是超越民族与时代的，具有超前性。文、史、哲的经典更是关注人性的根本，不懈地挖掘人的灵魂的深，同时也是语言的典范，具有永远思想和语言的魅力。经典的阅读，可以使年青一代从生命与学习的起点上，就站在巨人的肩上，占据了精神的制高点”，“经典的阅读，是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使语文教学真正介入学生的生命活动的关键与基本手段”。

我们主张：“对经典的选择的视野应该是广阔的”，“首先要有民族的、现代的、世界的、人类的眼光”，“中国传统经典文，中国现代经典文与外国经典文在《新语文读本》的选文结构中，应大体保持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在中国经典文的选目中，要注意少数民族的经典文。外国经典文的选择，更是要注意选择多民族、多国家、多地区的经典文。特别要注意东方国家、拉丁美洲、非洲等往往被忽视的国家的经典文”。“其次，要有一个‘文化’的观念。不仅应该选文学经典，同时应选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科学、宗教等内涵的，文字又是第一流的，特别是由这些领域的杰出学者所撰写的经典文章”。（参看《关于〈新语文读本〉编写的一些设想》）

6. 我们的“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观”。

我们多次说过，“对话”与“发现”是《新语文读本》的两个核心概念。在我们看来，“阅读活动实际上是通过与作者的对话达到对作者和自我的双重发现，最终达到知识的传递和精神的升华，使自己的内在生命本质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形式”。而“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读教育，又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活动”：其一，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有了教师与作者的对话，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其二，所阅读的是按一定的教育理念与体系编写的教材或读本，这就有了编者的参与，从而形成编者与作者的对话，编者与学生的对话，以至编者与教师的对话。其三，它是在一个教育集体中进行的……这就有了同学之间的对话”。“中学语文教育中的阅读就包含了这样多重的复杂的对话关系”，而又是“以每一个学生个体作为阅读主体与作者的对话为中心（出发点与归宿）的”。“教师与学生的对话，编者与学生的对话，同学之间的对话，都是为了给学生个体的阅读营造一个良性的语言环境，提供某种条件，而不能代替学生自己的阅读。我们再三强调‘学生主体性的自由阅读’也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给《新语文读本》规定的任务是：“为生动活泼的语文教学的生命运动提供基本的语言材料，营造尽可能广阔而自由的语言环境，从而形成‘读本作者—编者—教师—学生（包括学生集体）’四者之间的对话交流的互动关系。”（《〈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在写作教学中，我们也强调“对话”与“发现”。在我们看来，“作文，就是对话，是与他者（他人、社会，以至自然）对话，也是自己和自己对话”。孩子早就本能地和大自然、玩具说“悄悄话”；初中学生经常萌发许多新鲜的思想，又极敏感，不时产生莫名的忧伤，因此有极强的倾诉的欲望；高中学生更是有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与社会进行对话的发表欲望。作文教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诱发、引导学生的这种内在的写作欲望，变他人（老师、家长……）“要我写”为“我要写”，使作文真正成为自己

精神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不堪承受的负担。另一方面，“作为学校教育中的写作，还应该注意对学生生命本身的开发和提升”，因此，我们主张，要把“引导学生发现周围世界以及自我内心世界”，即所谓“发现大自然、发现自我、发现社会与发现大师”，“作为作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并且贯穿从小学到高中的全过程”。（《关于中小学写作教育的断想》）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出，我们也只是在面对语文教育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从语文课外读物编写的角度，作了我们自己的思考，提出了探索性的意见和主张，并不试图建立新的语文教育体系，因为不仅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有限，思考也有待深入，而有的教育难题，我们甚至是有意回避的。但我们为“中小学语文学教育”的建设贡献“一砖一瓦”的努力，却是自觉、严肃而认真的。

我们在编写《新语文读本》时，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语文知识”的问题。这其实正是当时语文教育论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是反对“语文知识中心论”的。我在第一篇全面阐述语文教育改革思想的文章《以“立人”为中心》里，就明确地指出：“以语文的知识体系为整个语文课程体系的中心，这就导致了过分地追求语文知识自身的系统性与学术性，产生了内容偏深、分量过重、要求过高、烦琐、陈旧等弊端。现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指导思想，明确以‘语文能力的训练’为整个语文课程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语文知识的讲授要有助于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与提高，应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对现有的语文知识进行重新清理。”这里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指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语文知识观”的弊病。一是“知识中心”，忽视学生实际语文能力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熏陶，课文成了语文知识的例证，语文课变成纯粹的知识课；二是所要讲授的语文知识本身也有问题，把语言学的知识原封不动地搬到语文教学中，其实，那些知识即使在语言学界也是有争议的，而到中小学语文界却成了不容置疑的，要学生背诵的僵硬的考试标准，这就是我所说的“烦琐、陈旧”。——我至今仍认为这样的反省是正确的，必要的，可以说是推动语文教育改革必须走的这一步。但即使是当时，我们也并没有否认语文知识教育的意义，我们强调的是“改变指导思想”和“对现有语文知识进行重新清理”。于是，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编写的一些设想》里，就有了这样的任务提出——

如何处理语文知识的传授、语感的培育及学生言语能力的训练、习惯的形成三者的关系，这是《新语文读本》编选与语文教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并有了这样的设想——

语文知识的传授是必须的、不可缺少与忽略的；但应是为语感的培育服务的，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不应该追求自身的完整体系。因此，在本《读本》中，将在初中第一、二、三、四册中，附简明的“现代汉语文字、词语与语法知识”，在高中第一、二册中附简明的“古代现代词法、语法比较知识”，作相对集中的教学，并在课文阅读中指导学生运用这些知识去加深对文章语感的领悟与理解。本《读本》将淡化文体意识，注重指导学生通过课文文字、篇章结构的咀嚼、讨